

# 张煦侯及其《通鉴学》

陈尚君

张氏幼习经子，学出塾师，虽进新学堂，仍眷情文史，自拓疆域。著述皆存旧学根基，参新学因子，足成一家言。《通鉴学》之内容既如前述，其成就前人讲之已多，局限亦显而易见。初版出版至今已七十三年，张煦侯逝世已逾五十年。1957年此书再版时，作者曾稍有删改，并撰《再版自序》，表达他对时代改变后认识的相对变化。但也可从中读出，所作删改所涉极其细微。

今年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准备重印近人张煦侯先生所著《通鉴学》，嘱我写一段介绍文字。我在从学之初曾认真读过《通鉴学》，对阅读《通鉴》，启迪治学，颇有助益。那前后曾通读《通鉴·唐纪》，以后著《旧五代史新辑会证》，曾仿照司马光《通鉴》先做长编的办法，对五代史料有详尽的排比，对司马光史学更增深刻的服膺。故乐于写点文字纪念司马光，也介绍张煦侯的大著。

## 张煦侯之生平与学术成就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杨柏岭编《张煦侯文史论集》，附有三篇张氏生平事略，可据以了解其生平经历。

张煦侯（1895—1968），名震南，以字行，笔名张须，书室名秋怀室、唐风庐。世出桐城，移居淮阴，至煦侯已为第七世。幼习四书五经，乡里有神童之誉。稍长则科举已废，十五岁入南京中等专业学校预科，十八岁入江苏法政专科学校。三年毕业，归于淮阴第六师范授法制经济。性不喜之，寻弃而钻研桐城古文。辗转馆于淮阴徐家，为其助理省志征访事，得以遍览群籍。年二十五执教于扬州第八中学，专授国文，历十八年之久。与范耕研、王绳之为友，研读诸子，崇尚朴学。抗战军兴，中学解散，淮阴沦陷，张氏携家避难洪泽湖滩，结草为庐，命曰唐风庐。退居六载，以气节自尚。其间据先前读书笔记，著成《通鉴学》，藉表彰温公史学以明志。书自194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，名重学界，曾多次在中国大陆、香港和台湾重印。

抗战胜利，张氏先后执教于扬州中学、上海震旦大学、徐州江苏学院。1953年起，任教

于安徽师范学院，直到1968年逝世，得年七十四岁。

张氏生当清季，经历数度鼎革，长期任教于中学与师范学院，生活地点远离中心城市，与主流文学史圈也殊多隔膜。然学有根柢，兼通文史，于新旧学术尤能细心体会，自成认识。平生勤勉，颇多著述，除《通鉴学》外，已刊有《师范国文述教》《中等学校实用应用文》（皆商务印书馆1927年）、《国史通略》（中华书局1930年）、《通志总序笺》（商务出版社1934年）、《王家营志》六卷（1933年铅印本）、《淮阴风土记》（1937年铅印本，台湾曾重印，见尤坚《文史名家张煦侯》），记《秋怀室杂文》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）。未刊者尚有《四史读记》《清政十论》《秦共通论》

《秋怀室文编》《尊疑室杂文》，诗词集数种，和1950年至1968年日记十一本（据许琦《张煦侯传略》）。

最近出版的《张煦侯文史论集》，收录张氏学术论文28篇，多撰写于1949年前。较突出者有以下几篇。《研究国学之途径》，1935至1936年发表于《国光杂志》，四万余言，分经学、史学、哲学、文学四编，表达在新学渐占主流背景下国学之价值，颇多通达之见。《郑樵著作考》，为其著《通志总序笺》一节，所列达九类五十七种，堪称大备。《万季野与明史》，1936年刊于《东方杂志》，补订梁任公说之未详，为那时的学界热点。《北音南渐论证》，1947年刊《国文月刊》，以己所居

淮阴为基点，以入声在北音中的变化，谈其南渐之痕迹，篇幅不大，意义重要。《〈唐语林〉中的口语成分》，1958年撰，次年刊出，篇幅逾二万，详尽讨论唐代新词的渊源，新词的多音节倾向，重点探讨口语虚词，在那时实属难得。凡此皆可见张氏以旧学积累，涉及当代学术，尤得益于长期任教的积蓄，信笔所至，皆能不同凡响。

## 《通鉴学》之成书与内容

张煦侯就《通鉴学》之成书与写作缘起，在初版自序中

有说明，盖以《史记》之作，太史公颇为自负，班固《汉书》，亦谓“穷人理，该万方，纬六经”，而温公书成，毫无尊异之心，其言卑谨，且陈“其间抵牾，不敢自保”。张氏认为“以不世出之巨编而揭谦若此，是岂不足以深求其故也”。同时，更有慨于后世史家“或毛举其抵牾”，而于温公“用力之勤，网罗之富，抉择之密，叙事之有条不紊”，常缺乏必要之认识，因成此通论《通鉴》之著。

张氏自述，早年因循世俗，仅看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和朱熹《通鉴纲目》，对温公之学缺乏认识。三十以后，买得《通鉴》本书，积十多年之阅读，方有体会，更认为自己“性刚才拙”，与温公助手刘恕性格颇同，世乱螭蟠，避地乡间更类温公之退而著书。据他自述，因避地乡间，不仅无书可查，连《通鉴》本书都没有带出来，手边仅有历年阅读《通鉴》所摘资料 and 阅读心得之札记。如此困顿之中，大约更便于脱离《通鉴》所涉1362年间的各种史事是非，从闾通的立场揭示《通鉴》之史例与价值。

《通鉴学》分七章，总约十一万言。各章要旨，可以根据张氏本人1948年为《图书季刊》所拟介绍来稍作说明。

第一章《编年史之回溯》。述《通鉴》前编年体史书之沿革与分野，以明司马光著书之渊源有自，并非创格。唐刘知几著《史通》，有《二体》一目，分论纪传体与编年体之不同，于编年体溯始于《春秋》。张氏则认为“《竹书纪年》、殷墟卜辞、诸侯史记，则为三代之编年史体。左丘明出，乃集大成”。《通鉴》主要是承续《左传》而成书。

第二章《通鉴编纂始末》，此章述《通鉴》编纂之缘起，引温公嘉佑间之书信议论，见其早年之认识，述其受诏后所得之支持，三位助手之分工协